

西医往来才俊出

——广东十三行的西学迹象

方益昉

史学界应该惊讶的是，伯驾在报告中，重点分析了加大培训清国西医人才，并将他们送达欧美医学院深造的计划。这份西洋留学提议，比目前认为中国最早的容闳版出洋奏议，即1867年后，容闳向江苏巡抚丁日昌，首次和盘托出的“教育计划”，提前25年还不止。

有关广州“十三行”在中国社会进程中的经济地位和历史作用，梁家彬先生1937年所著《广东十三行考》，基本确立框架。尽管后学新论不断，“十三行考”已成显学，但是，论述视野很少注意这个满清开放窗口，在促进西医东渐和外向人才培育方面的萌芽迹象。

1841年9月，入驻广州十三行、行医5年有余的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皮特·派克(1804-1888, Rve. Peter Parker, MD)，即清代通事旧译“伯驾医生”者，以中华外国布道会美籍医学传教分会(Medical Missiona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)名义，致函苏格兰首席医生约翰·阿伯克龙(1780-1844, John Abercrombie, MD)，详细介绍入华医学传教业绩，同时借机募集善款，以期拓展兴医规模。

史学界应该惊讶的是，伯驾在报告中，重点分析了加大培训清国西医人才，并将他们送达欧美医学院深造的计划。这份西洋留学提议，比目前认为中国最早的容闳版出洋奏议(容闳著，徐凤石与恽铁樵译《西学东渐记-容纯甫先生自叙》，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)，即1867年后，容闳向江

苏巡抚丁日昌，首次和盘托出的“教育计划”，提前25年还不止。

“基于国王学院已经设立奖学金，专注医学传教培训。皇家外科学院已培训了专门人才，伦敦教会将洛柯哈特(1811-1896，旧译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)派至中国从事医学传教，也应该将中国年轻人送往英国，接收医学传教培训……其实培训中国年轻医学专职人员的工作，我们已经实施，非常有效。好些年轻人正在广州的培训课程中，他们与社区关系密切，可用汉语和英语同时教习。有位学生的父亲(笔者按，实为叔父)支持儿子放弃科举，投身西医。已经有纽约医学绅士承诺，皇家外科学院接受几位学生，他就赞助同样的学生名额。为何剑桥、牛津、利物浦、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大学不能启动类似计划？”

报 告内容翔实，将实施可能、预算估计和尚存难处，逐个加以讨论，目前国内学界还没引起重视。自民国初年舒新城《近代中国留学史》以降，探索近代中国现代化人才起源，学界先后成型幼童说、洋务说、庚款说、女性说等。笔者以为，19世纪最早

提议选送俊杰出洋留学，或直接在本土造就外向型国际接轨人才的，应该包括医源说在内的可能路径。

1.本土西医关亚杜

现代西方医学充任宗教侍女，有规划、有规模地登陆华夏，已成学界主流共识。1835年11月4日，伯驾在十三行猪巷(Hog Lane)3号，即新豆栏7号丰泰行(Fung-tae Hong, San-taulan street)设立新豆栏医局，无疑可视作传教士医生入华执业源头。其首日诊所工作日志记载(内容有细微不同，参阅Edward V. Gulick: *Peter Pa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* 1973,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):

一共来了四个求诊者。一位双眼全瞎的女性，另一位双眼视力几乎丧失，但不忍告诉患者，恢复视力渺茫，几乎没有治愈可能，声称竭尽全力。还有一位25岁的慢性红眼炎症，一位双眼翼状胬肉，伴右侧上眼睑内翻患者。

由于伯驾医术领先，免费为穷人治病，求医者日益增多。那个时候，卫计委官员还没有编入衙门序列，或者说，府台老爷压根儿不相信，不识岐黄的红毛番鬼，还有治病救人的能耐。可见，创新往往发端于政策盲点，是机遇的恩赐。年轻的花旗佬伯驾，钻了监管的空子，凭借西医好手艺，逐步赚到治病救人好名声。

生意兴旺，忙煞想干事、能干事的伯驾医生。他开始师徒式传授医技，最高记录同时指导5位本地习医者，从英语教学，到临床操作，规范培养。其中，伯驾最著名的学徒要算关韬，又称关亚杜(英文名Kwang Ato)，是伯驾研究助理关乔昌(林官，英文Lam Qua)的侄子。关韬就是伯驾经常向西方募捐人介绍的父子同心、投身西医传教事业的学习标兵(伯驾医学传教季度汇报，1841年9月版)。

19世纪30-40年代，通过科举选拔人才，还处于千年文官制度的兴盛时期。年轻

学子普遍以追求功名为首选，以期光耀门第，继而名利双收。而对关家这个十三行地区的传统商家，伯驾的出现居然影响了家族规划。商二代后人毅然放弃科举机会，拜师红毛夷人习医救人，以当下的话语表述，是属于思想创新、开拓进取的新一代。

从此，本土西医第一人关韬的生平，与新豆栏医局的发展联系起来。1855年，从费城杰弗逊医学院毕业的医学博士嘉约翰(1804-1901, John Glasgow Kerr, MD)将新豆栏医局升级为集博济医局、博济医学堂一体的医学机构，关韬以扎实的汉学与西学复合文化背景，凭借本土西医精英的独特身份，继续服务于博济，成为西方医学传教士云集行业中的顶梁角色。

博济系发展期间，关大夫一度从军，称其为我国军医第一人，也许不算夸张。但他人微言轻，在现代科学建军思想被朝廷全面采纳之前，仅靠个别医生的技能，无法改善部队战斗力，中日甲午战争的较量就是实证(宗泽亚《日清战争》商务印书馆，香港2011版)。

2.病理画师关乔昌

伯驾行医十三行，盛邀同文街16号绘画作坊的关乔昌画师与其合作。从目前流传于世的大量医学示意图来看，关画师对促进西医东渐，乃至西医现代化进程所做贡献，尤为特殊。我国医学史界对其成就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成果，远远不如包括耶鲁大学在内的西方学界。

十三行边界上的同文街是个华夷混杂的区域，特别吸引小商、小贩。关乔昌原本主业肖像作品，他技术好，销售一幅可入账15银元。但他常被客户议论，不愿为了多挣钱，美化肖像本人，看到多少细节，就画多少笔墨。所以，借用他的画作，当作研究史料，基本靠谱。

把画坊设在特区旁边，争做洋人生意，通常是画坊的基本业态。西洋商人来华定制精



伯驾医学传教集
辑(季度报告)

美瓷器，常常专门要求烧制家族族徽，或者外来文化特色的图案，以满足特殊用途。画坊则按照窑场的工艺流程，将外商带来的图案，重新绘制成符合瓷器加工标准的中国式作品。

为此，理解并且讲究解剖、比例、视角、焦点、明暗、色彩等技巧的西画画室，在窑场和外商之间，架起了西画东渐的桥梁。从明末利玛窦传入西画起，恐怕泱泱中华，只有苏州桃花坞年画师傅，以及广州十三行瓷画师傅，开始掌握西画的基本概念和用色笔触。

掐指算起，关乔昌可算19世纪最早的境外培养国际接轨人才。他曾经在葡萄牙人统治了几百年的澳门，师从英国著名画家乔治·欣纳利(George Chinnery 1774-1852)，深得油画真传。读者阅读关乔昌作品，其肖像、场景、视角和色彩，与欣纳利的大作极其相似。但关乔昌声称比洋师傅画得更好，理由是，钦差大人林则徐也请他画肖像。

在没有照相机等仪器设备的时代，伯驾出人意料地聘请这位懂得西方解剖、透视原理的画家，一起记录了上千个图文配套的临床手术写实案例。这支史上最早的中外合作医学研究团队，对广州地区罕见病，或者因为缺乏西医外科

(下转14版) ➔



伯驾
与关韬在
诊所，关
乔昌画，
1839年。